



千古日月照大地 万里江河映长天

何炼成遗体告别仪式举行

本报讯 6月20日,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我校经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何炼成教授遗体告别仪式在西安市殡仪馆举行。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程福波,省政协秘书长薛占海,省政府副秘书长张军林,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省教育厅厅长刘建林,省社科联主席甘晖,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省政府参事室主任徐晔,延长石油集团总经理张恺颀,西北大学原校长郝克刚,韩城市委书记亢振峰,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院长黄少安,山西财经大学学院院长张富春,西北大学全体校领导、职能部门负责同志及何炼成先生的亲属、生前好友、学界同仁及师生代表200余人参加了告别仪式。

告别厅内哀乐低回。两旁悬挂的“杏坛宗师 传真育爱 立德树人 千古日月照大地;学界泰斗 求实创新 经国济民 万里江河映长天”的挽联真实映照了何炼成呕心沥血春风化雨的一生。上午9时,告别仪式开始,仪式由校长郭立宏主持。校党委书记王亚杰介绍何炼成生平,他强调,何炼成同志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了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扎根西北,时刻心系国家的前途与命

运,在西北大学教学科研第一线工作整整70年,为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建设发展倾尽心血、为西北大学事业发展无私奉献,推动了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发展、推动了改革开放和国家现代化进程。

何炼成之子何钟代表亲属讲话,他介绍了何先生爱党爱国、献身于科研和教学的一生,并代表亲属致谢。到场的领导、亲朋好友、学界同仁和师生以黄白菊花寄托哀思,三次深鞠躬向何炼成遗体做最后告别。

在何炼成治丧期间,第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民建中央常务副主席辜胜阻,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陈宗兴,中共吉林省委副书记景俊海,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原副组长袁纯清,中共陕西省委原书记张勃兴,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马中平,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副省长赵俊民,教育部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马建斌发来唁电、唁函并敬献花篮。

省委书记刘国中,省长赵一德,省政协

主席徐新荣,省委副书记、延安市委书记赵刚,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程福波,省委常委、榆林市委书记李春临,副省长方光华等领导前往家中吊唁或敬献花篮,并对何先生家属进行慰问。

发来电、唁函、敬献花篮的单位和人还有: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领导小组、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中国《资本论》研究会、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等20余家学术团体;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等50余家兄弟院校;刘诗白、陈征、吴宣恭、逢锦聚、洪银兴、刘伟、李建平、常修泽、杨瑞龙、白重恩、姚洋等著名经济学家;张曙光、魏杰、张维迎、刘世锦、王忠民、张军扩、石磊、宋立、朱玲、李义平等千余名学生;陕西延长石油集团、陕西煤业化工集团、陕西投资集团等20余家省属国有企业主要负责同志;西北大学校友总会及各地校友会。(党、校办、经管学院)

愿已备音容在,斯人虽去风范存。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中国发展经济学奠基人之一,全国劳动模范、“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获得者、陕西省首届社科名家何炼成教授,走完了他跌宕辉煌的一生,离开了他笔耕舌耘的三尺讲台,离开了他经世济民的毕生追求。

何炼成教授的一生,是坚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是坚定捍卫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一生,是推动改革开放和国家现代化进程的一生,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的一生,是为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建设发展倾尽心血的一生,是诲人不倦泽被后世的一生。他的逝世,是我国经济学界和教育界的重大损失,亦是西北大学和经济管理学院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崇高风范,弘扬他的教育家精神,继承他的学术遗产,发扬他的治学思想,共同用满腔的激情、创新的思维、开拓的勇气、执着的追求、强烈的责任感诠释新时代西大人的优良作风,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我们要学习和继承何炼成教授的“大志向”,坚定信仰,爱党爱国。何炼成教授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共产党员,极具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自青年时期就投身革命,在湖南浏阳老家成立地下组织“青年德泽同志文艺社”,在中共湘赣边区地下党工委的主持下成立浏阳南区党支部,发展党员十余人,举办农民夜校,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积极开展迎接解放的各项工作。投入武汉地下党领导的各项学生运动,积极参加各类进步文艺团体活动。新中国成立后,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党爱党,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党为党,以拳拳赤子之心和实事求是态度全力投入党的事业,即使“文革”期间受到政治运动冲击,他仍以满腔热情和超人毅力,时刻心系国家的前途与命运,致力于通过理论研究解决党和国家前进道路上的曲折。共产党员就是要时刻不忘初心、不移其志,一生为党的理想信念不懈奋斗。

我们要学习和继承何炼成教授的“大学问”,经世济民,知行合一。沿着“生产劳动论——劳动价值论——市场经济论——所有制结构论——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中国发展经济学——西部大开发”的研究轨迹,何炼成教授毕生出版了学术著作40余部,发表文章500多篇,荣获国家级、省部级教学与科研奖励30余项。他在科学研究中坚持真理、坚持创新、坚持服务国家战略和国民经济主战场,始终为中

《政治经济学批判》《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为随后从事《资本论》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1956年结业返校,适值党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何炼成所在的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制定了向科学进军的计划,自己也计划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问题。他从近代开始,先研究孙中山和谭嗣同的经济思想,先后写成《试论孙中山的社会经济思想》和《谭嗣同经济思想概论》两文,这两篇学术处女作达到了当时国内经济思想史研究先进水平。接着又发表了《试论孟子·墨经中的价格观》,观点得到同仁赞许。

骤然兴起的反右斗争迫使向科学进军的浪潮戛然而止,经济系陷入批判的漩涡。运动迭起的形势下,关起门来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已不可能,恰好“大跃进”中提出了价值规律和按劳分配问题,何炼成转而研究劳动和劳动价值论问题。他在《经济研究》上发表了《试论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价值规律的作用》一文,肯定了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重大意义和作用,批评了把价值规律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对立起来的观点,否定了把按劳分配当做资本主义东西加以批判的谬论,展现了理论工作者排除干扰、求真务实的可贵品质,学术界关于生产劳动理

做为学生为事为人的大先生

本报评论员



爱撒教坛写春秋

——追记何炼成教授

□ 李世宽

2022年6月18日,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中国发展经济学奠基人之一,全国劳动模范、“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获得者、陕西省首届社科名家何炼成教授走完了他95年的光辉人生,驾鹤西去。广大师生和社会各界垂泪送别,为我们失去了一位呕心沥血、独树一帜、报国之民的好老师、好学者、好党员而扼腕痛惜。

《左传》有言:“太上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何炼成在幼年时候,就以“三不朽”勉励自己做对国家和社会有用之人。人生白驹过隙,初心历久弥坚,他以高洁的品行、突出的贡献、等身的著作成功兑现了曾经的梦想。学生在挽联中称颂他“改革创新超前经世济民功千秋,开放包容携后传道授业德万世”,斯人虽逝,风范长存,何炼成已经成为照亮后人前进道路的一盏明灯。

年少立志图强国

1928年,何炼成在湖南省浏阳县金刚乡何家村一个三代书香之家出生,高祖父何德笔是乾隆年间举人,曾祖父何向荣是同治年间进士,祖父何火耕在光绪年间考中秀才。但他们都没有外出做官,而是在家乡开馆授徒,间或行医济众,颇得乡人好评。祖父对何炼成影响至深,老人在诗中写道“平生志事付闲鸥,辜负驹光六十秋。不惯车裘轻俗眼,竟教书卷白吾头。”这首先显示着学问、淡泊名利的抱负与人格的诗歌也成为何炼成后一生的写照。

父亲何纯台齐商从戎,征战在外,在1938年阻击日寇进攻庐山的战役中负伤致

残。母亲刘粹煌经常对着何炼成等子女吟诵“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等边塞诗。

兵荒马乱、国难当头时期,何炼成开始他的童年生活。到5岁半的时候,母亲把他送到何氏族小——菁华小学学习。读至高小,“七七”事变爆发,为防止日寇空袭,学校搬到山中寺庙办学。在寺中学习的一年半时间里,何炼成密切关注抗日形势,学会了“义勇军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松花江上”等抗日歌曲。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学校搬回市镇,教学秩序恢复正常,学生中建立起自治会,何炼成当选为主席。

高小毕业后,何炼成徒步90里,考入湘东地区名气最大、师资最强、条件最好的礼陵湘东中学。在肖顶平、杨伯峻、宋家修、向志民、王彦如等老师的悉心教诲下,何炼成知识水平不断提高、政治立场更加进步。

1947年7月从湘东中学毕业后的何炼成考上了当时全国五大名校之一的国立武汉大学。2个月后,他身穿粗布学生装、提着皮草箱子,进入到钟灵毓秀的珞珈山。在这座学术殿堂里,他得到了张培刚、刘涤源、谭崇台等鸿儒俊彦的精心塑造。教授们用西方前沿经济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展开教学,把何炼成引进了经济学的宏伟殿堂。进入大学第二年,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推动着革命形势日益高涨,武汉大学掀起一波又一波的学运高潮。何炼成积极参加进步组织,投身革命运动。1948年元月回到湖南,在老师肖顶平和伯父何金台等支持下,成立了名为“德泽同志文艺社”(“德泽”寓意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社团,通过个别串联的方式发展了首批12名社员。返回武大后,

何炼成同文艺社书信联系,邮寄了《新民主主义论》、农村工作手册等材料。何炼成在武汉大学也立即投入了武汉地下党所领导的各项学生运动,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社,组织并领导了“眺望经济学会”学习进步书籍活动,多次参加地下党领导的罢课、游行、声讨、抗议,参加了反对迁校、保校保护、迎接解放等活动。

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发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的庄严宣告,令何炼成等多年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热泪盈眶。根据长期申请和各种表现,他在经济系党支部大会上被全票批准入党,同时被通过的还有他的老师张培刚教授。

1951年,何炼成完成学业,作为新中国第一届大学毕业生,他怀着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的满腔热血,郑重填报了到大西北去的志愿。组织安排他到位于古都西安的西北大学教经济学。这所创建于1902年的著名学府还没有完全从战乱流离中恢复元气,校园简陋、条件艰苦。他心里想“这哪里像所大学,连我们湖南一个中学都不如,同我的母校武汉大学一比,真是有天渊之别”,但他一心一意在此扎根,把此后的毕生经历都献给了这方土地,这所大学,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改其心、不移其志。

经世济民治学问

到西北大学报到不久,意气风发的何炼成在校长侯外庐的勉励下,很快进入工作状态。侯外庐告诫何炼成等年轻教师:“做学问就必须下苦功夫,要有坚强的毅力和百折不挠的意志,要有‘做学问就像吃生猪肉’的精神,才能学有所成。”

正当投入紧张教学的时候,党中央决定在全国进行土地改革,并号召高等学校师生下乡参加。何炼成参加了西北大学党总支领导的土改工作队,赴汉中地区进行土改。4个多月的耳闻目睹,使他开始深入思考如何确定地主分子、富农家庭和富农分子如何定性、剥削率如何计算等理论和政策问题。回校后,他按照侯外庐要求认真学习了《资本论》第一卷,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价值和实践价值的理解大大加深。1952年底,他被安排到西北局举办的马列主义学习班学习。通过张宣、茹季扎、郭琦等教师的讲解,他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部分的启蒙教育。经过一年半的学习,他以优异成绩被录取到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学习。三年中深入学习《资本论》



(上接一版)和“劳动价值论”成为省内重点批判对象,被定性为“反革命修正主义观点”。他先后被派到长安县、高陵县和咸阳去接受“社会主义教育”。

结束咸阳社教回到西北大学后,灾难性的“文革”正在全国兴起。何炼成被学校的造反派扣上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孙治方在西北的代理人”等帽子。幸而造反派对他理论观点的批判吊不起普通民众的兴趣,加之他有理有据的辩解常常令批判者难寻破绽,对他的批判后来不了了之。

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把混乱的国家重新掰回到正常的轨道,科学技术和知识分子迎来万紫千红的春天。进入“知天命”年龄的何炼成以夜以继日的奋力苦干试图弥补失去的时间。他出版了10余本专著,主编了30多本教材和丛书,发表了500多篇经济学论文,超额完成了给自己定的目标,即每年出一本书,每月写一论文。

在生产劳动论方面,逐步完善了60年代观点。其中《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特殊含义》一文获得首届孙治方经济科学奖。《生产劳动理论与实践》一书获西北西南地区优秀图书奖、陕西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在劳动价值论方面,他结合《资本论》的研究写出了《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上的伟大变革》一文,获得陕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也谈劳动价值一元论》一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新世纪里,他又发表了《劳动、价值、分配“三论”新解》《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三篇新论,全面地阐述了对社会主义劳动和劳动价值的认识。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方面,他在七八十年代末即系统研究了商品经济的共性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特性,在学术界率先提出,除社会分工这个前提和基础外,还应从社会主义经济中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多元多层次的结合方式来论证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存在的原因,系统阐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在专题思想史方面,他系统阐述了西方价值学说史和中国古代从先秦到清初近两千年的价格理论发展史,就中西方价值学说展开对比研究,为后学者提供了宽广的视野和简明扼要的研读资料。80年代中期,他着手构建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的理论体系,主要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再生产循环原理,从“富国”“生产、分配、消费”各环节、宏观管理等层面,将中国历代思想家的经济管理思想进行概括提炼,由此为社会提供思想与方法论指引。

何炼成的主要研究成果目前收录在《何炼成选集》《何炼成文集》《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研究和认识》《社会主义劳动新论》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等五本专著中。从中可以发现,他各个时期的研究兴趣既追踪学术前沿命题、又勾连社会发展问题,以回答中国之间、人民之间、时代之问为己任,在革命建设的肥田沃野中跋涉,在卷帙浩繁的书斋资料中寻绎,从具体实践中升华出理论结晶,又以正确理论指引具体实践,他的治学方法体现了

爱撒教坛写春秋

——追记何炼成教授

□ 李世宽

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生产逻辑和社会发展逻辑的高度统一。他心里装着大情怀,手上握着硬本事,在深入思考事关党和国家全局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上作出了真学问、拿出了好成果。

滋兰树蕙育英才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何炼成组织马列主义教研室的8位政治经济学教师,恢复了20年停止招生的经济学专业,但是当时“左”的思潮还没有肃清,不少成绩优异的考生因为家庭成分、社会关系等政治问题而被高校拒绝录取。何炼成冒着引火烧身的风险,与校长郭琦等商量,为这些政审落榜的优秀考生网开一面,依据考试分数破格录取。这不仅仅是录取几个学生的问题,而且直接关系到人才能否得到发现和培养的大问题。西北大学七七级经济学专业共招收了49名学生,这个班后来涌现了全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青年学者,挑大梁的政府官员。

何炼成在《突出创新,肩挑新星,攀登高峰》一文中谈到了他培养博士生、硕士生的体会。他觉得,要鼓励观点创新,必须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两个“三不”方针结合起来,第一个“三不”指的是毛泽东提出的“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第二个“三不”指的是陈云提出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何炼成又加了一条“不唯师”。他倡导学生大胆设想,小心求证,自由地开展学术研讨,只要言之有理,论之有据,能自圆其说。对学生提出的一些当时看来“离经叛道”的观点,他不会横加批评,而是循循善诱,带出了一种积极探索出新同时又尊重不同意见的健康学术风气。

何炼成确立了西北大学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两史一论”(《经济史、经济思想史、《资本论》)的方法论框架,学生都要学习由何炼成亲自主讲的《资本论》专题课。对学生们来说,这是让他们最害怕也最有收获的一门课。80年代初开始,有学生表示对《资本论》不感兴趣,认为马克思100多年前写的东西是过时产品,国内有关知名高校也压缩了《资本论》课时而增加了西方经济学内容。何炼成坚持把《资本论》课程作为经济学专业学生必修课,强调学生必须攻读《资本论》原著,从原著中领会马克思分析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大力改进教学方法,突出专业性和科学性。《光明日报》1997年1月刊发题为“这

么多经济学家缘何出自西北大学”的通讯,解析远离政治经济中心的西安的省属高校西北大学能够培养大批颇有造诣经济学家的原因。西北大学能够享有“经济学家的摇篮”的美誉,与何炼成等老师们的努力密不可分。何炼成在小小的三尺讲台默默耕耘至90岁高龄,生病之前,每天很重要的工作还是教学,批阅研究生的论文。他先后讲授过7门课程,受业学生过万人,门下桃李芬芳、人才济济,为国家改革开放和西部建设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人才支撑。他培养出的学生共8次获得孙治方经济学奖,魏杰、张维迎、刘世锦、张军扩、王忠民、李义平、宋立、石磊、朱玲等经他魔棒点化的学生活跃在改革开放前沿,在我国的经济学研究与教学领域、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等方面,提出诸多前瞻性观点,贡献卓越智慧和力量,产生了广泛影响。何炼成因此被尊称为“培养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家”。

张维迎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说:“不论我在什么地方,导师的教诲总在伴随着我,是何老师将我引入经济学的殿堂,教给我经济学的知识。”魏杰曾说:“成为何教授的弟子,这是我一生的起点。我后来之所以能在经济学研究方面取得一些成绩,完全是因为我一开始就成为何教授这样的名师的弟子。”刘世锦也说过:“作为学生,不论我们在哪里,做什么工作,都牢牢记着我们学业上的根是在西大,记着把我们引进经济学大门,在人品和作品上使我们时时受益的何炼成老师。”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韦苇教授在献给恩师的文章《前面有一盏指路的灯》中写到:“我的导师何炼成先生,他的胸怀像博大的海,我只能采海中的一朵浪花;他的思想像一部精深的书,我就像是一个小学生,踮着脚尖,仅掀开了书的一角。”

殚精竭虑兴西北

何炼成的导师张培刚教授是中国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人。他继承和创新了导师的学术方向,把中国发展经济学作为中国经济学的核心问题,认为中国发展经济学应当重点研究西部和西北的经济问题。他表示,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往往是某类或某些问题较为突出不同,西部地区基本汇聚了我国发展所面临的各方面问题,但是自然资源丰富,潜力巨大,具备进一步发展的基础设施条件,拥有一批比较先进的中心城市和愿意献身西部建设的人才,只要坚

持改革,密切协作,扎实工作,就一定可以迎头赶上乃至超过东部地区。何炼成的这些观点得到学界和政府的认可,他主编的《中国发展经济学》和林毅夫、史晋川等经济学家的作品一起获得首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

何炼成主张,没有科学的理论,就没有科学的实践,没有科学的实践,就不可能振兴西部经济。因此他迫不及待呼吁建立“西北学派”。“西北学派”的任务是密切结合西部地区特点,探讨振兴西部经济的理论、战略规划和联合协作等问题。在此基础上,参加全国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讨论,争取在全国的发言权,以尽快振兴西部经济。

1997年,何炼成出版了50多万字的著作《历史与希望——西北经济开发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众多设想在他脑子里碰撞,一幅美好的西部开发蓝图已经在他的心里形成。该书由著名经济学家马洪和时任陕西省省长程安东作序,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两年后,又主编了《西北地区市场经济体制研究》和《两个决定》与陕西经济发展》两本著作。在1999年党中央向全国发出开发大西北的动员令后,他提出了“富民强区”的目标战略、可持续发展的长远战

略、科教兴区的人才战略、非均衡发展常规战略、跳跃式发展的非常规战略、差异化战略、水资源战略、产业结构调整战略等8种战略,以及关于基本经济制度、矿产资源开发政策、调整价格政策、特殊的金融资本政策、特殊的财税政策、建立分类调控的西部发展政策体系、特殊的人才政策、特殊的城市政策等8条政策,得到了国务院和陕西省的采纳。他还主编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对策·论证》一书,积极参加在成都召开的西部论坛第一届国际研讨会和在西安召开的第二次论坛会,会上发表了《西部地区投资软环境与制度创新》文章,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面对21世纪知识经济的到来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严峻挑战,考虑到西北各省区的要素禀赋和现有的经济基础条件,何炼成提出了“西部地区以富民为根本,以开发人力资本和科技创新为手段,以市场为导向”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专门设计了一套可以整合为一体的系列子战略,设计了“二龙共舞、三横四纵”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型。“二龙共舞”的龙首交汇在西安,“三横四纵”在陕西境内成“井”字形交叉,陕西成为西部经济网络的中心。鉴于陕西在西部大开发承东启西、东传西进的桥头堡地位,他建议决策者给予陕西及西安特殊的投资支持和政策支持。

何炼成是从国际视野定位西部问题,在很多全国性问题的讨论中,都走在学界前沿。在与魏杰最后一次长谈时,他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理论解释上还做得远远不够,没有从理论上说清楚是什么在真正推动中国发展,要继续做深入研究,这样世界才会了解和承认“中国模式”,甚至有可能问鼎诺奖。当然这个目标不是一两个人能够实现的,需要数代学人的接力耕耘。

学人小传

何炼成,男,汉族,湖南浏阳人,中共党员,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中国发展经济学奠基人之一,全国劳动模范、“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获得者、陕西省首届社科名家。著有《价值学说史》《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生产劳动理论与实践》《中国发展经济学》《西部大开发:战略、政策、论证》《何炼成文集》等论著60部和500多篇论文,是我国“生产劳动理论大讨论”的引发者和“新中派”的代表,中国“西北学派”的创始人,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研究的拓荒者。是首届“孙治方经济科学奖”获得者、第十三届“孙治方经济科学奖”获得者、首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奖”获得者,享受国务院突出贡献专家特殊津贴。曾任中国经济规律系统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资本论》研究会、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会、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常务理事。陕西省省劳动模范和优秀教师、省政协委员、省文史馆员,省社联名誉主席、省西部发展研究院院长、省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西北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经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陕西师范大学商学院名誉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20余所国内外大学兼职教授,4所国外大学客座教授。

唁电摘要

何炼成先生不幸逝世后,党和国家领导人、经济学界、亲友学生以及社会各界纷纷发来唁电,表达沉痛哀悼和深切怀念,以下是其中的部分摘要。



惊悉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一代宗师何炼成先生逝世,谨表示沉痛哀悼!

何炼成老师千古!

陈宗兴

2022年6月18日



西北大学何炼成先生治丧委员会并何炼成先生亲属:惊悉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何炼成先生因病不幸逝世,中国人民大学全体师生员工深感悲痛,谨致沉痛哀悼,并向何炼成先生亲属致以诚挚慰问!

何炼成先生一生忠于祖国和人民,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为我国经济学科和高等教育事业建设发展倾注了毕生心血。作为著名经济学家,何炼成先生在生产劳动理论、劳动价值论、社会主义所有制论、价值学说史、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等领域取得了开创性的重要研究成果,出版了诸多学术专著,为我国经济学界做出了突出贡献,被誉为中国“西部经济学派”的创始人。在西北大学工作期间,何炼成先生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创新人才培养方式,始终奋斗在教学科研第一线,推动西北大学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教学改革等各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为党和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深受贵校广大师生校友的衷心爱戴和教育界同仁的广泛赞誉。

何炼成先生的一生,是为党和人民教育事业的奋斗的一生,他的革命事业心、政治责任感和艰苦奋斗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为发展经济学科,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而努力奋斗!

何炼成先生千古!

中国人民大学

2022年6月19日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惊悉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教育家何炼成教授不幸逝世,不胜哀痛。何炼成教授不仅辛勤耕耘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造诣精深,著述丰厚,更长期致力于理论联系实际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胸怀坦荡,奉献一生,其学术风范和高尚品德久为学界所敬仰。何炼成教授的逝世是我国经济学界、教育界的重大损失!惟家属亲友节哀顺变,谨此致悼!

何炼成教授千古!

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领导小组:洪银兴 吴宣恭 刘伟 逢锦聚 林岗 李晓西 黄泰岩 庄宗明 刘灿 简新华 宋冬林 张晖明 谢地 张宇 黄桂田 张二震 林木西 赖德胜 邱海平 黄茂兴

2022年6月18日

另,敬请贵院以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名义敬献花圈。



何炼成教授治丧委员会、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惊闻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首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2006)获奖者何炼成教授,于2022年6月18日辞世。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和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全体同仁,对何炼成教授的逝世表示最沉痛的哀悼,对何炼成教授的家属表示最深切的慰问。

何炼成教授长期从事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专注理论创新,在中国发展经济学、生产劳动理论、劳动价值论、社会主义所有制论、价值学说史、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等方面,具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受到全国经济学界的重视,他先后荣获了多项学术大奖,是“西部学派”的杰出代表。

何炼成教授长期工作学习在西北大学,为西北大学经济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倾注了全部的精力和心血,是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重要的贡献者和领导

者。

何炼成教授始终把教书育人放在工作的首要位置,一直坚持一线教学,先后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为此,何炼成教授曾多次受到国家和省政府的表彰,被誉为“一代师表”。深受西北大学师生的爱戴和尊敬。

何炼成教授的离世,不仅是西北大学的重大损失,也是我国经济学界和教育界的重大损失。我们深切怀念何炼成教授!

何炼成教授千古!

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

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

2022年6月18日



何炼成先生治丧办公室及何炼成先生家属:

惊闻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陕西省首届社科名家何炼成先生溘然长逝,万分悲恸!

何炼成先生是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和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创始人,全国《资本论》研究权威专家,中国发展经济学奠基人之一,我国经济学界“新中派”代表,被誉为经济学“西部学派”的创建者。为劳动价值论、价值学说史、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国发展经济学和西部经济发展研究等作出了重要贡献。

何炼成先生始终心怀“国之大者”,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一生扎根西部,矢志教育报国70余载,追求真理、严谨治学,奖掖后进、桃李天下,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经济学家。一代学界巨擘,遽然星陨,实为我国经济学界和教育界的重大损失。中共陕西省委教育工委、陕西省教育厅谨向何炼成先生表示沉痛的哀悼,向家属致以最诚挚的慰问。

先生虽逝,风范永存。先生笃行不怠、甘为人梯的高尚品德和求真务实、勇攀高峰的科学精神,必将激励全省教育战线广大师生,提振精神、踔厉奋发、砥砺前行,为推动全省教育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新时代陕西追赶超越新篇章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何炼成先生千古!

中共陕西省委教育工委 陕西省教育厅

2022年6月18日



西北大学何炼成教授治丧委员会并转呈何先生家属:惊悉何炼成教授不幸去世的噩耗,西北大学经济系77级全体同学如雷轰顶,悲痛万分!

缅怀恩师情,心潮逐浪高。我们是西北大学恢复经济系的第一届学生,是何先生领导的“八大金刚”团队,促成了经济系的恢复,我们在何先生和老师们的引导下步入经济学殿堂,见证并参与了这一创建过程。我们这个群体中,走出了多位全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企业家,政府公务员和高校教师以及各行各业的建设者,大家在各自的领域不忘恩恩,为国贡献。是何先生造就了我们的靓丽人生,我们又是何老师的杰作与骄傲!毕业四十年来,师生们依然心灵相通,惺惺相惜,何老师牵挂着他的开山弟子们的每一点进步,而何老师的健康也牵挂着全班每个学生的心。

而今,恩师驾鹤归去,我等能不悲伤!恩师一生:为国育才,手栽桃李三千树;一生薄名利,坐守青毡七十年。回眸求学往事,四十五年化雨春风偏厚我,而今追思,仙踪难寻耳提面命更何人!可以告慰恩师的是:先生虽去世,文章留世功千古;桃李正芬芳,教诲铭心传百年!

何老师,天堂的路,请您一路走好!

西北大学经济系七七级全体同学顿首拜

2022年6月18日



恩师为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和人才培养,为理论经济学学科建设和平台基地建设,长期呕心沥血。

身居西安这样相对偏西、人力财力在经济市场化过程中很不稳定的环境中,能够在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上做出令学界商界万众瞩目的贡献,实在不易。先生的同辈们高度肯定,先生的几代弟子由衷敬仰。学界称其为“西北王”,他不是因霸气而王,而是以学聚气,以数十载心力广润四方禾田,汨汨然无声,茁茁然田丰。

先生千古!

学生:石磊

2022年6月18日

父影如书

□ 何林 何钟

我们敬爱的父亲走了。在饱含浓浓乡音的“浏阳河”乐曲中安详地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一程，离开了他笔耕舌耘的三尺讲台，离开了他经世济民的毕生追求，离开了他深爱眷念的家人学生。

父亲出生于湘湖水畔的浏阳，求学于江城珞珈的武大。生在“三代书香”之家的父亲，早年受到“研究史为致用之具”的经世致用思想启蒙，立志像他祖父一样“不惯车裘轻俗眼，竟教书卷白吾头”。1951年大学毕业响应国家号召，自愿申请到祖国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去。分配至西北大学后，扎根西北70余年，在小小的三尺讲台默默耕耘至90岁高龄，在三秦大地躬体力行探究经世济民之法、教书育人之道。他恪守教书育人本分，兼容百家之言，鼓励学生勤于思考、勇于探索，敢于实践；倡导言之有理、论之有据、自圆其说，用一生的专注和炽爱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经济学英才和栋梁。他所从事的经济理论研究，严谨而又枯燥，唯有热爱，可抵岁月漫长。父亲平日除了上课，其余全部时间都在阅读、写作；唯有热爱，不畏世间无常，在立言治学时，出于对真理的无比坚信，他坚持“不唯上、不唯书、不唯师、只唯实”，带领学生一起前行，在经济领域披荆斩棘、开拓前行，敢为天下先，一起探索国家经济发展之路。严谨求实的学风不仅使学生们终生受益，也影响着我们后辈儿孙，让我们在成长、学习、工作中，求实律己，宽

以待人，恪尽职守。

从小受父亲和家庭的影响，我们对阅读也有几分偏爱。记忆中的父亲并没有刻意要我们兄弟俩应该读什么书、必须读多少书，但父亲却总是要求我们要会读书、读好书。在繁忙的工作和琐碎的生活之余，我们时常会忆起小时候坐在父亲书桌旁翻看书页打发时光的悠闲日子。父亲的言传身教，虽穿过悠远绵长的岁月，但却依旧清晰地回响在我们的耳畔，深深地刻画在我们的脑海。与其说父亲教我们如何读书，不如说他在引导我们如何从读书中学会做人做事，总觉得那一点一滴的道理都被父亲春风化雨般融入了那看似平常的生活当中，悄无声息地引领着我们的成长，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在《论语》中，孔子把人生的目标总结为立德、立功和立言，而父亲对这三种人生目标有着自己简单但却实际的理解，他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做事先做人，要想做好事先要做好人”。我们清晰记得，父亲教导我们通过读书学习首先要立“德”，既要与人为善，更要以善待人，在生活和工作中发扬严于律己、待人宽厚的品德；其次要树“义”，意在对社会、对人民时刻保持敬畏之心，要以己之力弘扬正义；最后要学“技”，不断学习掌握独立生活、服务社会的知识和技能，努力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



何炼成教授和家人在一起

父亲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终其一生，父亲热爱真理、坦荡磊落，爱生如子、甘当人梯，正如一首无名颂怀小诗说的那样，“洁白的身躯，耿直的心眼。为照亮别人，将自己点燃。渐渐地变短，默默地消完。洒几滴热泪，化一道青烟。”

继承父亲遗志，才是对父亲最好的纪念。“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每个人能力有大小、生活际遇有不同，但不论身处何处，我们后辈儿孙一定会牢记父亲教诲，传承良好家风，勤奋敬业工作，踏实正直做人，让父亲在九泉之下瞑目安息！

父亲走了，离开了他耕耘一生的西大校园，离开了他追求一生的理论探究，离开了他奋斗一生的西北大地。父亲没有走，您虽然微笑不开口，但您毕生的心血和治学精神早已融入了弟子后学的信天游歌声里，融入了黄土高原的沟沟壑壑里，融入了国家发展进步的滚滚洪流中！

(作者系何炼成教授之子)

定西方经济学的具体有用分析部分的意见。虚怀若谷地采纳资历浅的年轻人意见，对于一个经济学大家来说，是很可贵的。他还以很大的热情支持我加盟西北大学，为申请博士生导师创造条件，虽因校际合作的安排未能如愿，但那热情安排，至今回忆起来，还是非常暖心。

第三，学术交往中的谦虚、谦让、君子风度。40多年前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为人温和，毫无架子。在参加小组讨论会讨论，游览公园，待人接物，处处可以体会到这种大家风范。在西北地区经济规律系统研究会成立大会主席台座位安排上，在经管学院领导班子与我的合照时，他一如既往地谦让硬要我站在中间。从他几次拍合照的小节可以看到他：工作是主角，合照是配角。

纸短情长。仅以此缅怀敬爱的何老师。您永远活在我心中。

(作者系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与何炼成教授

□ 李江帆



作者与何炼成教授在全国第十次消费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合影

我认识何老师可追溯到1981年10月。那时他是西北大学副教授，我是华南师范学院（现华南师范大学）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生，正在写服务消费品和第三产业方面的毕业论文，遇到难题要请教他。到武汉大学时，何老师恰好应邀回母校参加研究生答辩。我喜出望外。去不成西安，反倒在武汉遇到何老师，似乎冥冥中老天自有安排。

何老师肯定了我的研究，指出：选题是比较好的。过去忽视动态的使用价值，生产就谈物质生产，研究不够。物质生产劳动与非物质生产劳动的交换问题，1斤米=2小时劳动，理论上可以说是抽象劳动相等。从产品与劳务的等一性说明价值相等，有新意。作为“中派”代表人物，何老师的意见与我的观点不完全相同，但使我有机会在汲取正面意见的同时，广泛了解、留意、考虑反面和侧面的意见和批评，对我形成硕士论文的新论点启发甚大。此后在写作过程中我多次向何老师请教。

去年我才有机会在一次调档时看到了保留在华南档案馆的何老师对我的毕业论文的学术评语。他指出：“李江帆同志的《论服务消费品》毕业论文，在写作过程中他曾与我多次联系，我是积极赞成他研究这个问题的。这次看了他的定稿，认为写得相当成功，是一篇具有较高水平的论文。”主要特点和优点是：选题很好，基本观点正确，贯彻了理论联系实际方针，具有新意，结构严谨、逻辑性强，文笔流畅，能自圆其说，具有一定的说服力。

我不禁回忆起在我撰写硕士论文和即将答辩期间，中央权威经济报刊刊登黑熊头刊载批评服务是生产劳动的论文，形成了非常严峻的政治气氛，使我的硕士论文答辩几乎处于被动局面。长于研究生生产劳动的何老师的权威评语想必对我的毕业答辩和学位答辩的通过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两年后，该文第一章以“服务消费品的使用价值”为题在《中国社会科学》中文版和英文版发表，佐证了何老师真有慧眼。我非常感谢何老师在80年代全国批评第三产业的严峻气氛中对我的服务消费品的研究的倾力支持。这也是对创作第三产业经济学的支持，因为我的硕士论文

奠定了第三产业经济学的理论基石—服务产品理论。

1984年何老师出版了由他任主编，魏杰任助编的《价值学说史》，他希望我写书评。按理说，我这个33岁的小字辈是没有资格给大牌教授写书评的。我理解，他邀请我写书评体现了学术老前辈的宽广胸怀、唯才是举的胸襟、对年轻人学术上的无尽信任、热情关怀和大力扶掖。他从我做毕业论文研究起就关怀着我，从1981年毕业论文选题，1982年写毕业论文评语，到1983年厦门大学盛会推荐我任记录员，一直在热情扶掖我成长。何老师的胸襟和信任增强了我这个后生小子对老前辈的研究成果“指点江山”的勇气。

我在写好准备用于发表的正式书评时，另外写了一篇内部版书评，专讲缺点和不足，仅供何老师参考。何老师收到书评1+1后，非常高兴。他很欣赏并认可我提出的不足和修改建议以及“内外有别”处理方式。他感慨地对我说，《价值学说史》这本书，我送给很多朋友，看得最仔细、最认真、评价最中肯的就是你。你的书评写得很好，特别是对书的不足提出了细致具体的修改意见，很有参考价值。最近我才发现，《价值学说史》修订版，作了较大的修改和补充。何老师对我的书评1+1提出的赞扬和修改建议几乎“照单全收”。

1991年6月我到西安开会时，获悉我的《第三产业经济学》获孙治方经济科学著作奖。此时我更感激何炼成老师对我的硕士论文选题以来对我的关怀和扶掖。我去拜访何老师时拍了一张合照。我在交谈中回忆从事第三产业研究的往事，表达了对他的感谢。他很喜欢这张合照，收入《何炼成教授学术自传与影集》，说明他以我这个“编外学生”的第三产业科研成果获得孙治方经济学奖为荣。在我心目中，何老师永远是我敬爱的恩师。

回忆40多年来我与何老师的交往，我想起了毛主席的名言：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和何老师也是这样。共同的科研目标使我们从天南海北走到了一起了。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资本论、价值学说史、生产劳动；我从硕士研究开始研究第三产业，从服务消费品入手，研究服务消费品的使用价值

和价值，再拓展到第三产业，研究服务产品的产、交换、分配、消费，开拓第三产业经济学。由于研究课题相近，我的人生道路与何老师有很多交集：1981年“武汉巧遇”拜访何老师，确定硕士论文选题论服务消费品，写毕业论文论文评语；1983年当“临时代表”任生产劳动小组记录员，硕士论文（第一章）入选大会；1984年价值学说史“书评1+1”再探价值理论；1991年在“华山之巅”获知第三产业经济学获孙治方奖；1995年“加盟西北大学”在经管学院讲第三产业专题讲座；2002年因劳动价值论研究“相聚中南海”。我与何老师的交往几乎与第三产业主题相关。

何老师为什么能赢得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呢？他的人生经历留下什么宝贵精神财富呢？我感到有如下三点：

第一，一切从实际出发，不唯书、不唯上、不唯师、只唯实的学风。他的生产劳动的观点独树一帜，不跟风。如关于服务是否有价值，他与我的观点不完全相同，他认为第三产业不创造价值，但从未试图要我考虑他的观点，而是鼓励我独立思考。他的评语强调的是“能自圆其说”。他勇于坚持真理，在全国上下批第三产业的时候，坚定支持我的创新研究。他敢于根据实践发展修正错误。如他在1981年说承认三产业创造价值，主要是与现实统计不符，造成实际工作的混乱。在我的毕业论文评语中，委婉地批评服务消费品的价值问题论证不够。后来随着形势发展，他根据实际，修正自己的观点，撰文承认第三产业的划分。

何老师在陈云所提的“三唯”基础上，加了“不唯师”，这对研究生导师来说很有针对性，我认为也是他培养出如魏杰、张维迎、刘世锦、邹东涛等众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弟子的经验之谈。比较《价值学说史》的原创和修订版，我不禁联想，魏杰从80年代的“助编”做起，鱼跃龙门，终成大咖，这应得益于“不唯师”的为师之道。这或许就是传媒津津乐道的“何炼成现象”的真谛。

第二，关怀、帮助、信赖、鼓励、扶掖后辈成长的精神。他在学术之交往中经常设身处地的想到年轻人所处的困难，利用自己的地位、力量 and 影响力，尽力帮助有难处甚至处于逆境中的年轻人增强信心，克服前进道路上的种种困难。对初出茅庐，学有所成的年轻人的学术水平表现出充分的信赖。他想方设法创造条件，尽量提携晚辈，尽快走上成才之路，尽早挑上学术，对晚辈的每一点进步和成就，都感到由衷的高兴。

他对我的第三产业研究，从硕士论文选题到硕士论文评语，到第三产业经济学的写作，始终热情关怀。他把评价他的著作的任务交给我这样一个年轻的讲师来做，在修订版中全部采纳了我的意见，把我赞赏过的中国古代理学理论，由附录升级为篇，接受了我提出的要肯



恩师照耀我前进

□ 窦尔翔

我的恩师何炼成教授于2022年6月18日凌晨3时在西安不幸逝世，享年95岁。之前就经常听导师乐观地说“七十三，八十四。”并自信地说，我的身体还不错。现在导师实现了高寿九十五。一个基于11的等差数列，象征着中国经济学向上成双。这既有儿女们的孝顺，也含着弟子们的挂牵，更有他老人家保尔·柯察金般的坚毅。

恩师的音容笑貌一幕幕浮现，想表达的太多太多，在同门微信群中翻看着一幅幅饱含深情的诗句和挽联，不禁热泪盈眶。导师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是与时俱进的一生，是为人民大众经世济民的一生。我挂一漏万地写下一副挽联，表我寸草之心：“改革创新超前经世济民功千秋，开放包容携后传道授业德万世”。他不仅兢兢业业地育人，更开拓创新地将文章写在中国大地上，为民族命运和国家发展建言献策，身体力行。在这两方面，都有他可圈可点的贡献，可以弘扬借鉴的宝贵精神。

一是他的“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改革创新精神。何老师上课最精彩的是他在课堂上就某一点会列举多个甚至数十个各行各业代表性人物的观点，信手拈来，如数家珍。何老师实事求是严谨治学的作风也让我大受感动。记得我到北京大学经济系师从投资银行大师何小锋教授学习金融学，何老师向我谈起了当年尚是大三学生的何小锋老师在《经济研究》上发了一篇“劳务价值论”，引起了学界的批判，何老师说当时也指出“劳务价值论”有些偏右，让我代我向何小锋教授表示抱歉，并将这段文字写进了他的著作中。

二是何老师具有敏锐的超前思维。记得我1993年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硕士班学习时，何老师就已经组织编写了系列

有关市场经济发展的著作，在市场经济初期，这些研究成果系统全面、细致深入，让我隐隐约约感受到其中的系统论思想方法，这使我之后一直钟爱方法论在经济创新研究中的作用。2000年我刚刚上博士的时候，何老师就在互联网经济方面提出了很多超前独到的观点，要求我们写论文。大家接受任务后纷纷去泡图书馆，学习何老师那种集众研究家之长，“自圆其说”，推陈出新的研究方法。

三是何老师的开放包容是我永生难忘的。我硕士论文的题目是“创业退出机制研究”，我尝试向何老师提出博士期间我可否暂时搁置劳动价值论研究，先做些资本市场方面的调研实践，没想到何老师欣然允许，并推荐我去西安交大某集团公司投资银行部兼职。由于某借壳上市业务要在深圳待一年，大大超过了时间上的预期，何老师便借他在深圳调研的机会亲自召见我，我想可能会让我退学吧。出乎意料的是何老师耐心说服我尽快结束兼职，回学校补课。并鼓励我发挥对资本市场的偏好，“立功赎罪”，研究“西部金融发展问题”。

四是何老师在研究方面对我的

提携。一件事是我在1994年学位班期间，何老师布置我写了一篇关于“生产劳动”的文章，当时同学们在宿舍脑洞大开，展开大辩论，结果神使鬼差根据当时的社会现象在文章中得出“妓女也是生产劳动者”的结果何老师的评语是：概念混乱，一派胡言！但是鉴于你能深入分析，逻辑严谨，给你个“良上”。这对我后来坚持研究新问题，发现新逻辑的习惯影响很大。第二件事就是我要写一篇基于主体范围将东西方经济学统一起来的文章，八次耳提面命，十易其稿，扩压结合，最后何老师终于露出过关的笑容，递给我一罐杏仁露，改了一个标点符号，说，可以发表了。

何老师当时的精神面貌可以说是“站如钟，行如风。”“声如洪钟，满面春风。”我最佩服的是他老人家放废笔的大抽屉，满满当当，少说也有数百上千只。这些都说明何老师的工作始终处于一种“心流状态”。这或许是他工作卓有成效的秘密吧。现在我也如法炮制，将“爱、能、需”的原则用于学习、工作和教导学生中，在繁忙中享受“超级心流”美感。

(作者系何炼成教授学生，北京大学教授)



作者(右)与何先生合影

前面有一盏指路的灯

□ 韦苇

柳青说过：“人生的道路是漫长的，但关键的地方往往只有几步……”如果一个人在自己面临人生转折的关键地方，能恰逢名师指点迷津，他就会一下子柳暗花明，跃上人生一个新的高度。在我平生坎坷的旅途中，我亦算得上是幸运者。起码有三次重大的道路选择，得到了我的恩师何炼成先生的指引接送，何先生是我学业上的启蒙者，人生道路上的引路人。

我是文革中的“老三届”学生，也是西大经济系在文革后恢复重建的第一届——1977级学生。我们班49名同学，是何炼成先生一个个从第一批录取时以各种原因而被淘汰下来的考生档案中挑选出来的。而这些原因多是因为家庭出身、社会关系问题。是1978年2月《中国青年报》一篇题为《关于落实政策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的社论，送来了邓小平同志纠正“左”倾错误的思想光辉，方为我和我的同学们带来了转机。于是有一大批在1977年高考中因家庭出身问题而被“政审”落榜的优秀考生第二次被“扩招”进各高等院校，这些人中又以“老三届”居主体。

我是在第一批曾被某大学中文系初录，又被他们刷掉的受挫者，当接到西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时，是一种绝处逢生、饥不择食和感恩戴德的心情。我第一次见到何老师，是1978年4月19日报到后的当天晚上。上午见过的班主任程希韬老师陪同一位中年学者来宿舍看望我们，给我们介绍说：“这是我们系主任何炼成老师，是他把你们招进来的。”我面前的何老师，个头不高，稍稍白晰，宽阔的前额，架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操一口湖南口音的普通话，穿一套颜色已褪得发白的蓝色的中山装，何老师的这个形象从此便永远印在了我的记忆深处。他凭着对考生档案照片的记忆，辨认着我们，叫着一个名字，说着每个人的籍贯，使我们最初的紧张与拘谨心态，一下子全放松了，宿舍里充满了师生们的欢声笑语。

我的艰苦而漫长的大学生活开始了。此前，我酷爱文学，教过8年的初中语文，写过小说、编过戏剧，已形成了自己善于表述描绘客观事物外部形象思维定势和语言特色。现在一切从零开始，接触对自己完全是一个陌生领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一转变是在何老师的启迪与教导下，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一点一滴的啃读与消化吸收逐步完成的，它大约花了我两年的时间。何老师亲自给我们班讲授政治经济学这一整个经济类专业基础课。

何老师讲课不仅理论功底雄厚，一切烂熟于胸，而且极具艺术魅力。他讲课有两大特色：一是极为丰富生动的语言，他总是左右逢源、引经据典，时而比喻形象，时而妙语连珠，把本来深奥难懂的经济理论讲得深入浅出，令人豁然顿悟；二是他颇具个性的板书。何老师向来重视对学生进行理论系统的归纳与整理，总是把重要的理论范畴或条块，以极简明的语言，概括出其基本的框架，归纳成一、二、三……几条文字，板书出来，加之几个箭头与线条的联系，满黑板的生动与流畅，且又井然有序，文图并茂。而这一切，均是和生动的口语讲解同步进行的。何老师的粉笔书法，虽然不能算成一家，但极有自己的韵致，流畅圆润，速度极快，边说边写，看似不经意，笔下流光溢彩，与生动的亦庄亦谐的口语表述，相得益彰，互补互成。

何老师反复强调的是：“我不要求你们人云亦云，要不唯上、不唯书、不唯师，自己独立思考，提出自己的独到

见解，那怕和我的观点对立，只要你能自圆其说……”这是一种开放的思维，开放的教学，它有利于学生在宽松、和谐、生气勃勃的学术氛围中成长。到了二年级即将结束时，我们便能写像模像样的学年论文了。当时，我写的学年论文的题目是《关于关中农村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三步设想》，长约11000字。现在看来内容虽然显得稚拙，但文中充满了作为黄土地的女儿对黄土地的回报的赤子之情。何老师给了92分的高分，这是仅次于后来成为经济学家的魏杰的全班第2名的得分，并写了热情洋溢的评语：“文章写得扎实、生动，希望你用文学家的笔调写出经济学家的文章来。”

然而，我后来并没有沿着这篇论文的方向，继续搞农业经济或者相关的发展战略学。而是搞起了中国经济史学，这是何老师第二次对我人生航向的点拨。我记得那是我们大三的第一学期，何老师带着我们去陕西师大和该校政教系1977级举行学生间的学术讨论会。在乘坐的大轿车上，我恰好站在何老师身边，他对我进行了后两年学习方向的指点。谈话虽然只有几分钟，但何老师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因而语重心长。他说：“你将来搞中国经济思想史吧。这门学科刚刚起步，目前只有北大、上财和复旦三家，我们系也要把它作为重点学科来抓。我们系王一成老师正在上财胡寄窗先生那里进修，从师资力量来看，还需要配备年轻人。我看你中文底子好，有一定古文基础，将来就留校作我的助手吧。”我当时并没有搞经济史学的思想准备，也没有想到何先

生会这样器重我，但还是立即给何老师表了个乐于接受他这种安排的态。回去后仔细一想，何先生为我做的专业方向的选择，正是能够发挥我的潜能和优势的扬长避短的最佳方案，真是知其生莫如其师啊！从此，我放弃了对农业经济的关注，学习起中国经济思想史来。在何老师和从胡老身边归来的王一成老师的指导下，我以题为《试论西周至西汉中期重农思想产生、形成的历史渊源和历史地位》长达5万字的毕业论文，向何老师交了第一份答卷。

1982年，我毕业后留校工作，一直在何老师指导下从事教学和科研。出于学科建设的长远考虑，1984年秋天，何老师送我赴复旦大学从叶世昌先生，接受中国经济史学专业的严格培训。我在复旦进修了两年半时间，以全优的成绩修完了该专业全部硕士学位课程和专业方向课程。1987年元月我回到西大，回到何老师身边。我们师生这才开始了对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预期研究。何老师任主编，王一成老师任副主编，我们师生4人（另一位为杜干同志）于1988年编著出版了具有填补学术空白意义的中国第一部《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在学术界引起重大反响。我和王一成先生的《陕西古近代对外经济贸易研究》，何先生的《中国古近代价格理论和经济管理思想评介》，我的学术之作《司马迁经济思想研究》及师生们的30多篇中国经济史学论文相继出版和发表，尤其是在何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师生三人再次合著的《中国经济管理与发展思想新论》问世。我们师生坚持中国经济史学这个领域锲而不舍，不但在

科研方面在全国与北京、上海成三足鼎立，受到学术界同仁的重视与较高评价，而且在教学方面，在坚持中国经济思想史（或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课程的应有地位的同时，还结合各专业的不同领域，分别系列经济史学课程，使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在学科建设方面具有了浓郁的中国特色。

何炼成先生对我人生道路的第三次重大影响，是1993年冬天。当时，学校出于争取进入国家“211”工程，培养跨世纪的教师队伍的宏图大计，经上级主管部门同意，计划招一批校内在职博士生。当时我已45岁，是国家规定的报考博士生的最后年限。我自己并不曾想到攀登这个学历与学位的高地。何老师再次找我谈话，鼓励我作人生的再一次冲刺。我望着先生这几年愈加花白的双鬓，心中涌起了感情的浪花。我想到了十多年来恩师对我的扶持与厚望，想到了恩师自己几十年如一日对学术的执着追求，想到了多少年先生办公室窗口那明亮的灯光……我仅45岁，敢以“老”自居、自怠、自懈、自暴自弃么？我别无选择，只能知难而上！从此我又开始了报考、攻读博士学位的新的攀登。1993年一个冬天夜以继日地复习准备应考；高难度、高密度、高强度的3场考试，接之而来面试、复试、加试……，1994年秋入学后风雨兼程的攻读学位课程、准备学位论文、尤其是去北京外语学院进修英语的一个学期，我瘦掉了10斤肉，几乎蜕下一层皮来！然而我“衣带渐宽终不悔”，有进无退！因为我有恩师的鞭策与砥砺。

我的导师何炼成先生，他的胸怀像博大的海，我只能采海中的一朵浪花；他的思想像一部精深的书，我就像一个小学生，踏着脚尖，仅掀开了书的一角。我目前尚无力写出一部《何炼成评传》，我只想说：我的导师是我前进路上的一盏明灯。

（作者系西北大学教授，在何炼成教授身边学习和工作45年，文章有删减）

何炼成教授的治学育人思想

□ 马莉莉

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全国劳动模范、“有突出贡献专家”，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创始人和名誉院长何炼成教授，因病于2022年6月18日在西安逝世，享年95岁。扎根西北、甘为人梯，何炼成教授以坚定的信仰、毕生的热情，为国治学育人，推进了西北地区经济理论研究和高等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为创立中国发展经济学的西北学派奠定了坚实理论基础和人才基础。

治经世济民之学

何先生的童年和中学时期，正处在兵荒马乱、国难当头之际。通过勤奋学习，他考入武汉大学经济系，得到张培刚、谭崇台、刘涑源等经济学大师的言传身教，并深受张培刚先生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何先生被分配到西北大学财经学院任教，后赴马列学院培训中心进行了为期三年的学习，在中苏两国教员的指导下，他熟读《资本论》三卷，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奠定了坚实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功底。扎根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肥田沃土，何先生提出诸多具有创新性和前瞻性的理论观点，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关于马克思的生产劳动和劳动价值论。我国学术界对生产劳动理论的讨论，是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的。1962年，厦门大学的草英、佘金同志在《中国经济问题》第9期发表了《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一文，何先生于次年发表在《经济研究》第2期发表的《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一文与之商榷，从而拉开了生产劳动理论大讨论的帷幕。在这一漫长的学术研讨进程中，何先生不仅以其理论敏感开讨论之端，而且以其执着追求参与始终，先后发表十余篇论文，观点独到精深，其中，《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具体含义》一文获首届孙冶方经济学奖。

何先生认为，马克思有两种不同含义的生产劳动概念。第一种是

从简单劳动的角度来考察的一般生产劳动，第二种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角度来考察的特殊生产劳动即资本主义生产劳动。马克思关于一般意义的生产劳动的普遍定义和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具体定义，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不同方面来考察的。前者表明人对自然的关系，反映人们的简单劳动过程；后者则表明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即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

正是在考察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的特殊定义时，何先生在国内学术界率先把属于非物质生产领域的多种服务部门以及客运、邮电、文化、教育、卫生等部门的劳动划分为生产劳动，突破了长期流行的单纯从生产力或简单劳动过程看问题的传统观点，正确表述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是一定生产关系本质的反映”这一根本思想，并依据这一认识把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的外延扩大到非物质生产领域，这为国家进行三次产业划分和建立新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提供了理论依据。

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许多新现象新问题对经济学研究提出了新挑战。何先生在坚持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基本观点的基础上，系统论述了以下学术观点：强调必须坚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并对服务劳动、流通、管理、“总体工人”等的劳动性质及价值创造进行深入剖析，提出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共同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

二是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和市场经济理论。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关于计划经济改革的讨论中，何先生系统研究了商品经济的共性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特性，在学术界率先提出，除社会分工这个前提和基础外，还应从社会主义经济中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多元多层次的结合方式来论证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存在的原因。何先生系统阐释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就劳动力商品与劳动力市场、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市场经济新秩序、市场经济与现代企

业制度、资本市场、国有企业改革及社会主义股份制等重要理论问题提出了诸多前瞻性的观点。

三是关于专题思想史。基于坚实的国学功底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何先生较早进行了中外专题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及比较分析。为深入开展重大问题的研究与教学，何先生分别就价值学说史和经济管理思想史两大专题展开系统梳理。前者主要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阐述了西方价值学说史和中国古代从先秦到清初近两千年的价格理论发展史，而后就中西方价值学说展开对比研究，这为后学者提供了宽广的视野和简明扼要的研学资料。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改革开放全面推进、经济管理实践问题不断涌现的背景下，何先生创立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并着手构建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的理论体系，再生产循环原理，从“富国”“生产、分配、消费”各环节、宏观管理等层面，将中国历代思想家的经济管理思想进行概括提炼，由此为社会实践提供思想与方法论指引。何先生古今中外兼容并蓄的治学方式，确立起西北大学经济学研究与教学“两史一论”（经济史、经济思想史、《资本论》）的方法论框架。

四是关于中国发展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原来是西方经济学家研究发展中国家问题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在张培刚教授授发展经济学思想的启发下，何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开拓性地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作为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重点学科，并先后出版《中国发展经济学》《中国发展经济学概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等专著和教材，为构建中国发展经济学的内容体系作出了突出贡献。何先生的研究有以下特色：在理论层面，主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西方发展经济学相结合，提出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概括为“八化”，即工业化、城市化、商品化、市场化、社会化、国际化、信息化、知识化，并涵盖“八大关系”，即所有制结构、三次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国际经济、金融创

新、人力资本、可持续发展、政府法制和文化；在方法论方面，何先生强调创建中国发展经济学，需要努力做到经济学研究方法与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相结合，特别是需引入“老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新三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以及结合法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在实践层面，指出西北和西部是中国这一发展中国家的重点研究区域，中国发展经济学应重点研究西北和西部的经济发展问题，针对西部大开发，他创新性地提出“八大战略”和“八大政策”，实践证明，由中国学者从实际出发探索而来的发展经济理论，在指导西部发展和转型升级过程中取得显著成就，与不少拉美国家深陷“中等收入陷阱”形成鲜明对比。

守教书育人之道

何炼成教授扎根西北七十多年，一直坚守在教学第一线，培育学生超过万人。何先生坚持务实、创新、开放、包容的教书育人理念，培养的弟子人才辈出。

一是坚持实事求是。何先生要求学生“不唯书、不唯上、不唯师、只唯实”，摆脱思维禁锢，拥有思考问题的自主性，直面社会现实，实事求是，探究经济社会内在发展规律，寻找解决真实世界经济发展问题的有效方案。

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何先生在教学过程中，始终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强调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实践相结合，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三是勇于开拓创新。何先生提出，要“敢为天下先”“敢啃硬骨头”，在面对研究难题时，不能逃避回避，应不惧磨砺，敢于突破创新、锐意进取，开辟独特、广阔的发展路径。

四是讲究研究的科学严谨。何先生要求学生“大胆设想、小心求证”，学术研究需要发散性思维，更要求科学而严谨的探索和论证。

五是强调遵循教书育人的规律。作为教师，需要一手抓科研，一手抓教学，以丰富的前沿知识与与时俱进地充实教学内容；作为学生，需要一边打牢基础课，一边强化调查研究，在边干边学过程中强化理论认知、提高实践应用能力。

六是提倡开放包容。何先生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对学生的不同观点持开放和鼓励的态度，只要能够“自圆其说”，就应该被肯定。

何先生关注重大问题，教书育人理念务实开放，门下桃李芬芳、人才济济，为国家改革开放和西部建设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人才支撑。他培养出的学生共获得8次孙冶方经济学奖，魏杰、刘世锦、张军扩、王忠民、李义平、宋立、石磊等学者活跃在改革开放前沿，在我国的经济学研究与教学领域、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等方面，提出诸多前瞻性观点，贡献卓越智慧和力量，产生了广泛影响，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也因此被誉为“经济学家的摇篮”。

奠中国发展经济学“西北学派”之基

西北地区基础设施薄弱、经济发展水平低下，何先生来到西北后，用孜孜以求、笔耕舌耘的一生，聚焦发展中国家和西部贫困落后的现实挑战，积极参与全国性问题的讨论，以开放包容的思维、博古通今的素养，形成了独特的问题意识、方法论和学术观点，为发展经济学“西北学派”的创立奠定了基石。

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注重兼容并蓄。在长期治学过程中，何先生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吸收借鉴古今中外各家之长，融会贯通，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各阶段的重大实践命题，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服务改革开放实践的一系列重要理论和观点。

二是重视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实践面临的一系列重大复杂问题。何先生的理论研究并非书斋空谈，

而是直面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问题，其中尤为强调调查研究西部地区特别是西北地区的发展问题。与东部沿海地区往往是某类或某些问题较为突出不同，西北地区基本汇集了国家发展所面对的各方面问题，比如要素资源有限、产业基础薄弱、多重结构失调、生态保护任务艰巨、安全形势严峻等，有鉴于此，何先生倡导综合运用多学科方法，系统性地应对复杂问题，这决定了何先生研究的独特视角和方法论。

三是解放思想、开拓创新。何先生认为不管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西方经济学各流派，都难以给出有限条件下应对复杂矛盾的现成答案，这就需要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提出有实践意义的思路、观点与方法，并接受实践的反复检验。

四是从全国视野定位西部问题。何先生虽身居西部，但在很多全国性问题的讨论中，都走在学界前沿，如生产劳动理论、劳动价值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国发展经济学等。具备全国性、全局性问题的理论背景，为他思考地区性问题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对西部发展问题的研究也更具有前瞻性。

五是提出整体、动态的系统发展学。“中国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是中国发展经济学”。何先生以西北地区发展实践为导向的理论创新，表现出鲜明的整体性、动态性特征，也就是依循复杂矛盾内在关联、动态演化的特点，给出综合利用有限资源、全面应对复杂问题的系统发展学理论框架及观点体系。

何先生用扎根西部、奋笔疾书的一生，聚焦西北地区实践问题，为理论创新提供可行道路，勾勒出中国发展经济学西北学派粗线条的雏形。传承先生思想，推进我国经济学研究与教学的发展，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成为后继不容推卸的责任与使命。

（作者系西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本文原载于《光明日报》，标题有改动）